

解放五峰回忆录

孟 月 山

一、五峰概况

五峰地处鄂西南，是湖北省偏远山区县之一。该县四处高山峻岭，道路崎岖，林深茂密，地广人稀。其动植物资源均十分丰富，还盛产茶叶、香菌、山漆、桐油等各类土特产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记得当年春季常到乡下工作时，行走在白云深处中蜿蜒曲折的羊肠小路上，到处是一片鸟语花香，风景宜人，顿使我忘记了一切饥饿劳累，只觉心底豁然开朗。

想当年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遍布全县各地。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在长乐坪与白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后红军为保存实力，转移北上抗日，与五峰地下党失去联系，全县受了很大损失。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峰地下党仍坚持了不懈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五峰不少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他们和五峰部分进步人士到石门县和五峰县的边界处——壶坪山，组织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搏斗。并于四八年秋末冬初，这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从壶坪山拉到江北，找到江汉地委，参加了战斗，四九年随我军解放五峰时起了应有的作用。四九年十月（国庆后），我军进驻渔洋关，当时地方土顽恶霸还

没有消灭，就有不少进步人士和青年到县政府要求参加工作，如县中学校长周美阶带领渔洋关部分小绅士到县政府请求工作，并回本乡说服乡长全中林带着武装来渔洋关交械投降，还配合熊泾阳、邵朝炳共同说服国民党县长骆存之交枪投降，对五峰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二、干部调配

接管五峰干部队是原江汉四地委从各县调的一个县的编制，从县到区共五、六十个干部。四九年春节后在地委集合（住地在南漳县东巩），然后到江汉区党委住地（钟祥县双河）学习，准备随军过江支援解放江南。武汉解放后，我们从双河出发到孝感县花园车站一带住，时间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宜昌地委分配，地委通知我们队接收五峰，并把四八年冬从五峰壶坪山来江北四地委的一支游击队四、五十人也交给我们作为县武装。

在荆门，地委通知去五峰时，县委书记是李东坡，东坡同志找到五峰县地图，我们一起研究后，把五峰划为五个区：升子坪、渔洋关、长乐坪、采花区、城关区。由于五峰未解放，我们俩就帮助荆门县到农村征粮。这时地委又调走李东坡同志，县干部就只有李树棠同志了，我们两人在荆门皮家集一带征粮。四野过江时，我们随军到宜昌县的鸦鹊岭和宜都县（今枝江）的安福寺一带住。这时地委又派赵岩同志来任县委书记，我们从白洋过江后，在宜都朱家岗住了不久，地委又将赵岩同志调走了。我和李树棠带领干部在宜都聂家河区与当时四野的一个姓谢的团长住一起，等待五峰解放。

在聂家河住时，地委又派田中夷同志任五峰副县长。在庆祝“八一”建军节后，四野奉命进军湖南，田中夷随军南下未回，这时来接防的二野还未到，当地土顽趁机抢夺民财。我和李树棠同志即带全体同志回宜都附近住，直到过了国庆节。我去地委开会，司令部派陈家琛同志来任指挥长，地委书记王延春也正式通知，五峰不派书记，由我担任，这是五峰县未解放前的干部变动。五峰解放后，县委、县政府指挥部初设渔洋关，地委又从长阳调刘常在同志任五峰县委组织部长。

三、初进渔洋关

国庆节后，我去地委开会，军分区司令员汪昌贵同志找我谈话，说五峰即将解放，要成立县指挥部，派陈家琛当副指挥长，王书记（王延春）叫我任政委。陈家琛是个老红军，司令部还派些干部，以后还派些武装去。经我同意后，由汪司令把陈家琛同志找来当面向我介绍。第二天我们一块来到宜都住地朱家岗一带，陈家琛同志到后立即把指挥部建立起来，把连的建制也整编好。不几天我们率一个连的武装就到宜都五峰边境活动，李树棠和秘书陈子哲等几十个干部留在后面。不久，我又去地委研究工作，回来时，听在聂家河接我的同志说，陈家琛、李树棠同志已进军渔洋关，我不分早晚，当天赶到渔洋关，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一九八四年五峰成立自治县时，说渔洋关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渔洋关解放后，杨震洲同志到升子坪区，把他叔杨登武拉的游击队二十人左右全副武装合到指挥部，当时我任命杨登武到升子坪区当副区长，把武装全部留下整编为二连。杨登武当副

区长不久，被土匪暗算壮烈牺牲，朱高等同志遭土匪绑架被营救回来。

四、骆存之交械

渔洋关解放后，国民党宋希濂残部退出湖北，骆存之深感孤单，把所有亲信武装撤回邱家堡，梦想孤守山寨。而恩施解放、长阳县解放、湖南石门县（临县）早已解放，县指挥部又进军渔洋关，骆身为笼中之鸟。就派代表邵朝炳（县督学）到渔洋关，找我军谈判交械，邵朝炳来的第二天，熊涇阳也从宜昌来到渔洋关，五峰县中学校长周美阶等来访，还带来渔洋关部分小绅士到县政府。我接洽后，将部分小绅士送走，就和周美阶、熊涇阳、邵朝炳等人谈骆存之交枪问题，请他们三人同去骆存之家谈判交枪投降。他们三人走后，隔了两天，分区参谋长李炳南同志从长阳的榔坪、野三关等地来五峰县渔洋关，找到我们，当时陈家琛同志带一个连去湖南边境剿匪，我和李树棠同志接见汇报派三个人到骆存之家谈判交枪问题，陈家琛到湖南边境剿匪。汇报后李参谋长说已调宜都县指挥部一个营和远安县的一个营来消灭骆存之这些残余土匪恶霸，既然去人谈判交枪，等他两天。夜晚宜都县队伍来到渔洋关，远安县一营第二天也赶到渔洋关。第三天，我们研究进军，怕拖延时间。这时，他们三人从骆存之家回来说骆存之同意起义。周美阶还说服蒿坪乡长钟林芝把乡武装带到渔洋关交枪投降，我给来人讲了人民政府的政策，并说：“愿留者，听从指挥整编。愿走者，我们欢送”。他们交械后，便领了收条回家种田。李参谋长说：“骆存之起义晚了，只有投降，如果起义应在国庆节前，那时

我们是欢迎的。现在只有投降，你们去给他讲，否则只有强行缴械”。这时周美阶说：“骆存之脾气很坏，翻脸不认人，是否还去？”当时我说：“你们只管去，他不交枪，你们就回，不必勉强，也不必多说。因为你们先去过两次，现在不去就打他是不合理的，你们去，我军随后赶到”。他们三人走后，我和参谋长带领分区警卫连和宜都一个营从蒿坪进军将军洞。远安一个营和邢克山同志带指挥部一个排和长乐坪区、城关区干部，从长乐坪向城关进军。我们进军到将军洞对面山上吃中午饭，下午进军将军洞。将军洞驻军营长陈升之，他的枪械已交回邱家堡，在将军洞空手放哨。第二天早饭后熊涇阳、邵朝炳、周美阶回来，在将军洞把骆存之的意见向参谋长和我汇报，说骆存之要求起义，参谋长说：“只有投降交枪，别无话说”。熊涇阳坚持要去，这时周美阶、邵朝炳没有去，只限熊涇阳三个小时回来。三小时后不管熊涇阳回不回，我们就打，三个小时多一点，我们正准备打，熊涇阳回来了说骆存之同意交械，不算投降，也不算起义，要求留两条步枪、一支手枪。当时我们又请示地委和司令部是否可以，如可以就得给出路，骆存之到专区当参议。地委同意我们的意见，交械后可到专署当参议，同意给他留两支大枪、一支手枪；但交械后立即到专署，不得在五峰住。这样熊涇阳和邵朝炳回邱家堡，按我们意见今天马上交枪，他的人员须听从改编。下午交枪后，剩十几个人的改编到宜都县指挥部那个营。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进军，在邱家堡山下过，到据此有二十五华里处住下。这里还有一个笑话，骆存之听说解放军到了他的山下，他就偷跑到他房子后竹林子山上躲藏了，此时，熊涇阳和邵朝炳又叫他的人找出骆存之来，熊涇阳对他说：“解放军、人民政府说话算数，你不要

躲藏，他们均从山下过来，未有一兵一人上山到你家，军队大部分过去了，参谋长和县长还在后面，你是否迎接，和他们见见面。”骆存之不敢迎接我们，下午和参谋长住下后，熊泾阳、邵朝炳和骆存之的二老婆姓万的在骆存之大老婆家见我和参谋长（因参谋长住的是骆存之的大老婆家），并请我们吃了一餐简单的晚饭，还交出了国民党的信印，我接过交警卫员韩德桥收存。第二天，我们早饭后，进军五峰县城，此时邢克山同志已到城里两天，国民党县政府在邢克山同志宣传党的政策后，还算安定，看见我们不惊慌失措，我叫城关区把所有案卷封存起来。除邵朝炳留下外，其余的人员一律回家种田。没开伪人员会，有人说这是起义，这说法不对，要算起义的话，就得安排相等的工作，不能全部回家，这样就算告一段落。还有采花区未解放，这时采花区也派人来县城谈判交械，并请我们干部去采花。这时，我命令来的人回去先把枪缴过来，干部何时去，先回去等候。这时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刘美树等同志作好去采花区的工作准备。他们回去隔了一天，就把钱福堂的几支破枪送到五峰县城，这时全境解放。接着即听到向云东大股土匪从升子坪区沿石门、五峰边沿向西运动的情报，参谋长说：“这是消灭他们这股土匪的好机会。”参谋长马上率军去截击，五峰城只有我和我们指挥部的一个排的武装，当时想留下远安的一个营，又怕向云东大股土匪路过五峰边沿，又怕失掉消灭向云东的好机会。打这股土匪需要武装，但五峰才解放，远离宜昌，就先唱个空城计！（当时，我估计骆存之的枪未交完，他的人员回家，怕万一骆存之土匪性质未改，挺而走险故我处处警惕）。参谋长走时叫我代表他和我一块请骆存之、周美阶邵朝炳等吃顿饭，李参谋长走后，下午四点多钟，我召集城

内几位士绅和骆存之座谈时，我主持会议，请大家座谈。骆存之首先发言说：“我是交枪和平解放五峰，为五峰人民安全，但要打仗，我是打得过孟县长。”这时去座谈的人，特别是熊泾阳、邵朝炳、周美阶感到骆存之发言不礼貌，深感不安，当时城里我没有多大力量，骆存之隐蔽力量定不少，同时也知我不会让步，万一出了问题要吃亏。骆存之的发言也使我感到意外，座谈会上的气氛很紧张。我一看这会不好继续开下去，骆存之三言两语完了，在座的其它人不好发言，你看我，我看你。我看无人发言也好，我就说：“参谋长要我代表他请大家吃顿便饭，不说打仗不打仗的，今天咱们就吃饭，打什么仗？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打光了，还打啥！咱们去吃饭。”在座的感到这个发言很好，不轻也不刺激人，座谈会就此结束，大家说好，大家都感到我的话不多而有力，八百万军队打光了，你骆存之几个人算什么，这时我已把门窗布置好，我们两个警卫员也不离我身边。又隔两天远安一个营回来，李参谋长率军追击向云东而去采花区，骆存之听说打垮向云东土匪残余，他从内心佩服，也先告辞回邱家堡，我又去城里住了一天，就带远安一个营去骆存之家。

骆存之是五峰县血债累累的大恶霸、杀人魔王，他象旧社会占山为王的山寨主，坐地分脏的土匪。据说他派他侄子带领人到长阳县抢夺人民财产，被长阳县认出是骆存之的人，告到长阳县内去，长阳县派人到骆存之处要人，骆存之不认帐，当时长阳县来的人就认出他侄子是抢劫者之一。长阳县要带走他回去问口供。骆存之问来人看准没有，来人一口咬定是他去抢东西，骆存之也知道来人认的不错，骆存之拿出手枪立即将其侄子枪决，并说再认，有几个枪决几个。

骆存之说他对犯法人是不客气的，不管是谁，即是亲朋犯了法，一律按罪处理，应枪决的立即执行，绝不放过，来人一看，想带骆存之抢夺财物的人回长阳县问供是不可能了，也就生气回去了。

当骆存之从城里回去的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和邵朝炳从城里出发，邵朝炳问到哪里去，我说到骆存之家去。当时邵朝炳一惊，我说你怕什么，邵朝炳说你事先不告诉他一声，怕骆存之不满或者不接见，过去不管谁，去他家都得事先通知他，否则不接待，我回答没有。天快黑了，到了邱家堡，我叫邵朝炳前去和骆存之说，我今天带一个排和郝营长往他家，叫骆存之收拾房子住。其它部队住山下，邵朝炳先到骆存之家说：“孟县长来了。”这时他从山下往山上走，很快到了他门上。骆存之听说后感到很突然，为什么不先和他说一声。但队伍已到大门，我快下马时，才看见骆存之出大门接我，一块到他楼上，吃完饭后，骆存之问我住多长时间，我回答说：“还不一定，住下再说。另外专署要你马上去宜昌，你这就准备走。”骆存之要求多住一天，我说可以，同时晚上把其亲信邓子武等四、五人找去，陪我吃饭，也把他二老婆姓万的找去。第三天，骆存之就带一个随从一支枪离开邱家堡，他算永别了。他走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首先把附近群众找来开了个群众大会，宣讲我政府政策，主要讲我军解放全国，国民党彻底完蛋。然而，有些散兵败将游勇回家带回枪支弹药应交给政府，交出无罪。如隐瞒不报不交，政府查出后要严加惩处，轻的判刑坐牢，重的杀头。接着说去骆存之家开的会，同时也说骆存之给他留了两支步枪一支手枪，其他多余的枪支也交出来，否则与私藏枪支一样论处。共产党说话算数。象骆存之交枪后，我们还要给他事

干，还有饭吃。如当时不交枪，两军打起来就没有这样的好下场，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全部打光，剩下些土匪恶霸不堪一击。另一方面讲了农民安居乐业的大计，群众开完会后很高兴，大家七嘴八舌，有的群众担心藏骆存之的枪害怕交出来又怕骆存之回来不得了，特别担心自己不交，别人报了倒立一功，自己还要受重处罚。“知情不报，罪加一等，窝主不报，加重处罚”这时骆存之的小老婆就把他的小手枪交给了我。不长时间，邓子武马上把两挺机枪、几支大枪和几箱弹药交出，我不但说邓子武无罪，还表扬了他。邓子武向群众宣传几天后，把所有隐藏枪支基本交出，约二十多支新步枪，十几箱子子弹、一支德国二把匣子枪。我从电话中告诉骆存之后，骆存之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那很好。”就这样骆存之夹着尾巴去宜昌了，专区分他任务帮助做煤球，以后就到稀水农村接受教育。听说五二年土改时，五峰要回骆存之镇压了，这是骆存之血债累累又隐藏枪支准备东山再起而罪有应得。

采花暴乱清剿记

李树棠

1949年11月，国民党五峰县县长“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骆存之，慑于我军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被迫向我军交械，五峰宣告和平解放。但是，一些旧军政人员、渣滓团伙、土顽并不甘心他们的灭亡，暗地和我们作对，使社会秩序不得安宁。当时我们要收枪、征粮、没收鸦片，加之我们的乡村干部一时配不齐，有些事仍需利用旧职人员去做，而当地人民对我们这些做法一时还不够了解，他们即借机进行反动宣传，煽动群众对我人民政府的不满，进而组织以采花区为主的反革命暴乱。

五峰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初设渔洋关，我当时任县公安局局长，鉴于当时情况，经县委研究决定由我负责将全县国民党的乡长、保长和土顽头头弄到渔洋关训练两天。训练中我们向他们宣传了革命形势、党的政策和当前任务，并严正指出：“你们过去是有罪的，现在必须改恶从善，将功赎罪，如继续作恶，将严惩不贷。”这次集训对安定和利用这些人起了一定作用。但极少数死不悔改的坏分子却利用这次集训暗地串联、煽动，叫喊“五峰是种大烟的地方，有烟才能换苞谷，政府不准我们种大烟，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跟他们干。”这些坏分子回到乡、保后又煽动地主、富农、旧职人员叫喊“减租减息不公平，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在少数

地方，他们一度由暗地活动到公开张贴反动标语，打冷枪，甚至发展到暗杀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

一、土匪暴乱

位于五峰县西北丛山之间的采花区，原“反共救国军第一支队”支队长钱福堂，民族乡乡长、汉流头目王务之，在“湖北省保安副司令”袁亮甫的策划下，向我政府假投诚交械，将煮过的子弹和破旧枪支交我政府，暗地却隐藏好枪四十余支不交，并广泛联络石门向云东、刘福清，鹤峰王协堂、白溢桂孔道、湾潭肖云卿等土顽头目，相互配合，伺机发难。

钱福堂、王务之等匪首从交枪后至十二月底，连续在地龙坪、牛庄召开两次原“反共救国军”的骨干、部分乡保头目的秘密会议，策划“秘密联络，分头组织、伺机起事”的暴乱计划，煽动乡保人员、地富分子、地痞流氓以负担不公、减租减息过重为由，抗粮抗税，胁迫群众与政府反征粮，反交鸦片。给钱、王匪出谋划策的袁亮甫，深知这群乌合之众绝对成不了大气候，于五〇年三月装病向松滋方向潜逃。

1950年3月底，宜昌军分区派往五峰的机动三营奉命在渔洋关整编。伺机发难的钱福堂、王务之认为我主力部队在东部，而西部区中队力量薄弱，起事时机已到，立即分头集结匪众，联络外地匪首，以求暴乱后前来采花支援。

4月5日，采花土匪暴乱准备基本就绪，4月6日暴乱全面行动。由于内奸的告密，首先由王务之带领十余名匪众，埋伏在万家岭黄家，将我去牛庄的区中队长蔡康三人伏

击。当场打死我战士一人，绑架蔡队长和一名税务干部，劫去我步枪二支、手枪一支，随后匪徒酷刑拷打蔡队长，蔡临死不屈，被乱刀杀害在大荒坡上。

王务之等匪众伏击得逞，连夜又在陶家垭王家，将在此工作的付华民、张东民等四名税务干部包围，张东民与匪搏斗，被匪众打死在竹林中，付华民等三人被绑架，劫去步枪四支和公文、粮食等物。

6日深夜，城（关）采（花）电话线被匪徒切断，城采要道火烧岭被封锁，以保长、反共团分队长肖真轩和恶霸地主、绥靖少校参谋胡宇洲为首两股土匪，企图以内外配合，夹攻我区政府。但两股土匪到达区政府时间不一，山下一股提前开枪，山上匪徒误认区政府还击，两股土匪互射一时，方知误会，这时天已黎明，只得撤走。驻区主任（书记）刘美树立派区中队指挥员王海清带人通过封锁，向城关区书记覃克山汇报敌情。

同日晚，另一股土匪以涂词云为首，组织六十余名匪众，以抬棺木为名与区中队一班住户勾结，袭击区中队战士。区中队战士立即与匪徒搏斗，终因为量悬殊，班长蔡祥银牺牲，两名战士被抓，劫去轻机枪一挺、步枪二支、子弹八百余发，其他战士撤走，后才返回区政府。

混入我方征粮队伍的匪徒胡宇洲，自6日晚偷袭区政府未逞，于第二天（4月7日）回区政府时，向刘美树谎报敌情，“覃厚然（六保保长）在叫喊昨晚把区政府打了。”刘主任未识奸计，一听火冒三丈，外森一丢，只身就要去抓覃匪，最后在同志们劝说下，才带助理干部张官波一同前往，胡见计得逞，立即转身通知覃某，叫肖真轩拦劫。刘、张二人行至白虎村时，当地群众暗示刘主任“气候不好”。刘才

知中计，急忙返区，但时机已迟，在返回到沙子坝过桥时，被埋伏在桥头岩石内的肖匪三人枪击，刘、张身中数弹，昏迷落水，土匪将刘张拖至河边，补枪杀害，劫去手枪、步枪各一支。

4月9日，钱福堂、王务之等匪首在毛腊屋再一次策划攻打区政府和抢劫长阳付红乡驻军枪支，伏击收尸部队计划，并派人催促肖文卿、桂孔道组织土匪前来采花助威。

（之后湾潭肖文卿即带20人进到采花边界时，因听我军有增援部队才返回去了，白溢桂孔道因我军围剿断其联系）

4月10日以王务之为首在二龙坪组织20余名匪众，到长阳丰竹园（长五边界）企图抢劫工作组枪支，因未见工作人员，计划落空。立即带众匪与各股匪徒合围区政府，土匪带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余支和一些刀矛、土枪土炮，与煽动、胁迫的群众二、三百人向区政府摇旗呐喊，我驻区的干部、中队战士见敌情严峻，便以阵待援。下午从湾潭赶来县大队二个班，冲破敌人包围线与区汇合，土匪见我武装力量增援，仍以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黑夜向我驻地攻击。我指战员不管土匪叫喊、枪击和偷袭，利用碉堡和有利地形沉着应战，使匪徒无法接近我方阵地，敌我对阵至黎明，群众跑光，匪徒们也无法隐藏，被迫撤退。

继后土匪又企图伏击我收尸（刘美树、张官波遗体）部队未逞转向抢劫长阳傅红乡（现傅家堰）驻军枪支，被我驻地的机动三连发觉，由连长何同玉同志率领部队追击到牛庄、大村，匪徒与我部队稍事接触，逃窜羊寨一带荒山隐藏。当时挽救被土匪绑架的付华民等三名税务干部时，逃窜的匪徒在我追击部队返回后，又乘机杀害我驻金山工作干部杨世容，路过火烧岭修复电话线路的线务员余作威、朱建望

和购书回区的教师冯国斌。

二、清剿匪头

采花暴乱时，我县政府均驻渔洋关。四月六日晚城关区委书记邢克山同志打电话向县委报告说：“采花电话不通了”。当时我以为是断了线，而不到十分钟，邢又打来紧急电话“采花方向打枪了”。接到采花土匪暴乱急情，县委、县大队、县公安中队负责人迅速研究，立即组织部队。第二天一亮我和县大队长何子龙带部队百余人急赴采花。到达城关后我带二个班二挺机枪从城关经火烧岭到采花，走到火烧岭时土匪就放我们的冷枪，我们于是用机枪扫射，土匪见势不敢再阻击我们。

下午赶到采花，区政府的干部战士都在碉堡、大屋内驻守。土匪胁迫群众不准给我们粮食，工作队员都饿着肚子，情绪不稳。我们去后先将武装部队进行了战斗部署，把机枪架在碉堡，然后解决粮食问题，后找到一个保长，我们也知道他参加了暴乱，对他说：“你给我们弄些粮食来，把参加暴乱人员找回来，我们既往不咎，你如果搞鬼，就对你不客气”。以后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参加暴乱的人员也回来了一部分，我们立即审讯了一些保甲长，才知杀害刘美树、张官波、蔡康大体经过，并派部队将刘、张、蔡等烈士的遗体进行安葬。

4月17日分区独六团邹团长带领四个连开进采花，土匪见势对他们不利都藏了起来，我们立即采取政治攻势和部队清剿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号召群众与土匪划清界限，不窝藏

匪徒，不给匪徒一粒粮食，协助政府捉拿袁亮甫、王务之等匪首，对其家属教育他们规劝家人弃暗投明，暴乱局势基本平息时地区文工团又来采花作文艺宣传工作，在军事上派遣部队围剿和组织便衣小分队跟踪追击。4月29日，隐藏在火烧岭一带的土匪一个中队与我区中队相遇，我中队战士与土匪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打死打伤匪徒三人，我中队伤亡二人，敌我相持之时，在楠木桥一带的独六团一部立即用炮火增援，匪徒怕我南北夹击，纷纷逃窜。

4月30日，钱福堂、王务之几股土匪集结于五鹤交界鸳鸯池，匪首为给如丧家之犬的匪徒打气，封官许愿。为粮、枪、弹紧缺，弄出一个“搞到一支步枪奖大烟十两，一挺机枪五十两，跟着拖每月三斗苞谷”的奖励办法，进一步策划“拖出采花，与邻区外县联合，分头抢粮、抢枪”，在采花内暗杀基层干部、积极分子，能弄到粮食，则不择手段的抢。

以匪首王务之一行四十人与鹤峰王协堂一组，汇合百余人围攻鹤峰百鸟坪区政府，抢劫粮物，并烧毁区政府房屋。继而又窜回湾潭焦耳湾骚扰，被我县大队击溃，匪中队长陈绍轩等十余名匪徒被我军俘获，残匪逃至采花后槽一带隐藏。

土匪的骚扰连连遭到失败，我乡、村组织、民兵队伍相继建立。通过宣传教育，人民群众觉悟不断提高。隐藏各地的匪徒只有东逃西藏，得不到消息，也得不到粮食，就向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报复，大村农会主席谭本之和一位与我报信的农民遭到土匪杀害，水瓢子姓车的三户农民的粮物洗劫一空。群众对土匪恨之入骨，积极协助清剿部队烧了他们的息棚，毁了他们的巢穴，王务之等匪徒已在本地藏不住了，

带匪逃至板厂，又被我军击溃。王又带残匪到大磨坪与邓燮臣、郑家宪汇合围攻我两河口区中队，但阴谋未得逞。我军与郧县武装部队配合，合围王、邓众匪于西庄坪，在我军严厉打击下，击毙匪首郑家宪，打死打伤匪徒数十人，除王务之、邓燮臣等少数漏网外，基本完成清剿土匪任务。

二、为不给匪徒以喘息机会，尽快肃清残匪，捉拿首恶分子，一面对降匪进行集训，对他们交待党的政策，指明出路，运用宽严相济，对认罪好、罪恶轻、有立功表现的经过登记就地释放，对民愤较大，而一时又难以结案者，则由公安部队从采花押送五峰城收审。对其部分潜逃在外的匪徒，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运用“飞行小分队”围山搜捕，使残匪纷纷下山向我政府投降交械，一些土匪骨干既怕抓获，又怕内部举报暗杀，终日提心吊胆，最后象胡宇洲一批土匪头目也不得不向我人民政府投降。暴乱发生后一直以生病为由长期藏在山洞的暴乱头目钱福堂，已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从山洞里爬出来，向我政府交枪投降，参加暴乱策划的县参议胡显卿潜逃长阳，也被我“飞行小分队”抓获归来。

三、历时三个多月的清剿斗争到七月底，除袁亮甫潜逃，王务之、鄢厚然、夏玉林不知去向外，百余名暴乱分子均被我军抓获，共缴获暴乱分子枪支110余支，机枪一挺，刺刀单刀、单号40余件，手榴弹38枚，子弹4500余发，我军民在此战斗中牺牲干部、战士、群众14名。

四、“八·一”建军节召开军民共庆大会。会上，地县领导作了总结讲话，对清剿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英灵表示深切哀悼和高度评价，对立功者给予表彰，大会在一片歌声中结束，会后独六团胜利返回宜昌。

三、围剿王务之

暴乱虽已平息，但斗争并未结束。王务之等三名匪首尚未抓获，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我军民坚持几个月追踪不放。十月下旬，终于在长（阳）五（峰）边界的板栗溪湾发现王务之的踪迹。我便衣队和区政府分头审讯为王送饭送炭的王××（王务之叔父）和王务之的子女，迅速查清了王匪三人的躲藏山洞，我军民近千余人包围各个山头，对王躲藏的山洞发起猛烈攻击。但王务之、鄢厚然、夏玉林以悬崖山穴死守进洞独路，负隅顽抗，使我军民死伤十余人，直至包围到第三天早上，我军准备火力攻击时，王匪才在饥饿难忍、弹药甚少的困境中，提出要家属送饭后交枪的条件。为避免不必要牺牲，我方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但王匪三人饭后自知末日来临，自毙于洞中。

一批血债累累的暴乱头目，我政府仍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但他们死不悔改，仍在监狱中继续隐枪不交，并秘密组织集体逃跑，已实属怙恶不悛分子。一九五一年我人民政府为镇压反革命，巩固革命政权，对罪恶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十五名匪首判以死刑，七月间将血债累累的匪首钱福堂执行枪决。